

后工业社会中的延迟退休、社会保障 与工作能力

罗哲 张俊锋

摘要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形式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提出严重挑战，可能酿成总体性危机。延时退休制度在后工业社会的要求既无法延续社会保障制度，也无法解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危机。社会保障制度在后工业社会中自身难以维持，也无法解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危机。对前工业—工业—后工业部门的有向流动的速率控制有益于延缓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到来，但后工业社会的收割折现发展逻辑以及去制度化后的个体化正从宏观环境和微观选择两方面加速危机的到来。

关键词 后工业社会 延迟退休 社会保障 工作能力

作者罗哲，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力资本开发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张俊锋，四川大学人力资本开发研究所研究助理（四川成都 610064）。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7-0090-09

延迟退休一般被视作一种公共政策选择而加以研究，主要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不足等现实难题。延迟退休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所涉及的是劳动力与非劳动力的人群划分标准，所谓延迟是相较于现行的退休制度年龄设计而言的。延迟退休进入社会保障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分布于以下两个基本维度上：一是在记账维度上，延迟退休直接作用于养老基金的收支，对养老基金的维持存续有立竿见影的影响，这也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的生存；二是在现实维度上，延迟退休直接影响每年因退休行为而腾出的岗位供给，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减缓原有的制度化的劳动力结构调整，干预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节奏。

有学者将类似的研究视角归纳成养老金亏空和劳动力市场联动效应这两种视角并开展相应的研究。^①但这种归纳和分类并不准确且深度不足，原因在于：其一，只关注养老金的账面亏空而忽视了养老金建立和可持续运行的现实基础；其二，没有意识到延迟退休作为以养老金制度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我延续的一种短期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其三，只留意到延迟退休有可能引起的劳动力市场波动，而忽略延迟退休背后的伴随着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来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困境和社会发展总体性危机。

记账维度实际上是人们运用工具理性对现实维度进行简化并建立其数学模型，其基础仍然是社会现实。从现实维度着手能够更直接地切中问题的本质要害，以回应延迟退休是否能够真正达到预期目标，挽救社会保障制度，化解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① 邹铁钉、叶航：《普遍延迟退休还是分类延迟退休——基于养老金亏空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效应视角》，《财贸经济》2015年第4期。

一、国际比较与个案研究评价

常见的关于延迟退休的研究一般采用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如刘文和焦佩^①梳理了英德美日韩五国的退休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指出政党、企业和工会等是延迟退休争论的主要参与力量，争论的焦点是老龄就业的现实性。老龄就业的现实性是延迟退休制度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然而老龄就业的现实性所指向的却是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宏观背景，涉及国别或不同地域自身的发展路径和所处的特殊时空场景，而且，老龄就业不单单是老龄群体的内部事务，而是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形态改变传递影响整个社会的各年龄段人群。

也有以案例形式对单一国家的延迟退休制度变革进行专门探讨的研究，如对德国退休年龄制度改革的研究^{②③}、对延迟退休激励机制的分析^④、对法国退休制度改革和演变的研究^⑤等。这些研究比起采用国际比较方法的研究更关注特定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传统，着重分析一个国家以延迟退休或更广义的退休年龄调整制度应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成效，把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去审视其自身变革和持续运行的可能性，对退休制度内部的复杂性——包括制度自身所体现出的多种制度集合性质、退休渠道多样性、制度激励和引导有效性等——有更细致和深刻的讨论，使退休制度与其对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联得到更丰富全面的呈现。至于一些从不同的阶层立场及其信奉的行动主义出发去探讨延迟退休年龄^⑥以及退休的公平性^⑦则是一些更为细节的研究。

这些研究各有优劣，都作出了自身的贡献。国际比较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分析，但更多是从制度自身的生成和构建上展开，即分析不同的国家背景和经济社会环境下，延迟退休制度或退休制度变革的设计和演进，并希望从中找到一种具有一定复刻和借鉴意义的最适宜的政策选择，而不是去彻底反思延迟退休或进行退休制度变革的目的指向、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解决问题的真实效用。单一国家案例研究侧重于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传统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能够更有效地评估当前政策选择的效果，但一般同样局限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之内，缺乏超越社会保障的宏观叙事。

因此，总体上讲，这些研究普遍具有以下局限：沿用工业逻辑，困于静态惯性思维，委身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内并重申其原有的市场补位和调解作用。这三方面本身也相互交错。

二、工业逻辑、市场补位、静态惯性与后工业社会中的高速和断裂

上述的工业逻辑在这里有两个指向，一是工业生产逻辑。劳动力与岗位的配适性是毋庸置疑的。有多少个岗位就能解决多少就业，就能容纳多少人口，就能以每小时或每天生产多少个的产量进行生产。投入，包括资本、资源、劳动和技术的投入都是有限而且可以清晰的预期。二是制度逻辑。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逻辑的基础上出现的第一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中，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与区分，这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是一种明确的逻辑，亦即第一现代性中制度的行动逻辑为“或然”原则。^⑧

上述文献中的研究都致力于在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通过条文律法的设计将政府、企业、个体和其他组织的责任权利进行厘清。社会保障制度，也是这种工业逻辑的产物。沿用工业逻辑的问题在于用这种依附于成文制度的确定性去规范并不处于这种逻辑之中的问题，也不愿意面对社会发生的动态变化，体现为一

① 刘文、焦佩：《国际视野中的延迟退休演进》，《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② 戴卫东、顾梦洁：《德国退休年龄政策改革、讨论及启示》，《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

③ 林熙、林义：《德国退休制度的实践形态研究——基于退休渠道的视角》，《德国研究》2015年第3期。

④ 殷俊、陈天红：《美国延迟退休激励机制分析——兼论对中国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的启示》，《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4期。

⑤ 林熙、林义：《法国退休制度演变与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基于退休渠道的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⑥ 韩克庆：《延迟退休年龄之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⑦ 夏永祥、管斌彬：《延迟退休与社会公平辨析》，《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⑧ Beck, U. & Lau, "C. Second modernity as a research agend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 Vol. 56, Issue 4, pp. 525-557.

种静态惯性。即便是在最传统的工业部门，其生产的内容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的投入不再廉价，对劳动力的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工业经济出现转型，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典型的工业生产方式出现规模变化或者变体，知识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经济产业更是一日一变。劳动生产率和各种投入之间的关系不再明确，原有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规范制度，不足以应对现今的变化。

在这种工业逻辑中，社会保障制度所起到的是被工业生产榨干或淘汰或无法进入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人的最后生存保障兜底，是应对社会风险的最后一招。这些齐格蒙特·鲍曼所称的“冗余人口”或“废弃生命”^①，被迫进入社会保障制度的管辖，这同样是在市场逻辑运行下的结果，政府所建立起和社会保障制度，所起到的是市场补位作用，将消费市场上可以兑现的购买力赋予这些不能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收入的人。随着工业经济的转型，进入后工业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系统和其他社会制度以及在这些制度中的人，都与时代产生断裂。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持续，所显现的不单单是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的设计问题，也不单单是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的适应性问题，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究竟有无继续存在的必要，有无继续存在的能力以及应该以何种形式存在的问题。

后工业时代对人的能力提出新要求，也对现行制度提出挑战。这些要求能否被满足，这些挑战能否被妥善应对，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延续。“后工业社会”出自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指出“后工业的”概念与“前工业的”，“工业的”概念对应，前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源采掘，工业部门以使用能源和机器制造产品为主，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尤为重要是通信和电脑。^②而今，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理所当然地也被涵盖在内。后工业时代或后工业社会不是指整个社会都以某种单一部门为生产部门，而是指这个社会出现了后工业部门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贝尔指出必须重视这些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以及把握住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③正如中国并不是前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都完全消失，而是出现了后工业部门，因此也正处后工业社会。而本文所探讨的后工业，不单单强调这种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新变化，而是在此基础上考察后工业社会中前工业、工业的和后工业的部门的共存状态，与人（特别是作为生产者和劳动者的人）的关系，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表现为一种断裂或接续，如劳动者的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能力不足、用人制度的扭曲、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张，自我维持和无力为继等。而且后工业社会更表现为一种高速率和快节奏，无论技术革命在当中是否起着决定性作用，都无可否认人的工作和生活、企业的运作和营利变现和社会总体的创新发展都被高强度加速。从延迟退休这一切口进入，我们试图了解这种高速下的断裂与接续，以及所暗含的社会自身存续的危机。

三、三角分析框架构建：延迟退休、社会保障和工作能力

记账维度的研究着重养老金本身的运行和货币计量，对个体而言，通过延迟退休对原来生命周期之内的收入支出结构作出再修正，增长个体的在劳动力市场中提供劳动的时间以保证其所能获得的养老金收入覆盖其消费支出；对社会总体而言，延迟退休的可能效应直接体现为维持社会总体养老金的收支平衡。现实维度的研究着重考察延迟退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数量冲击和供给保障。这里隐藏着一个前提假设，即通过延迟退休增加的劳动力供给或使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规模维持在一个水平，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措施带来的产出效应和措施实施后的社会总产出水平，当中假定了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在实施前后不发生变化，而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群分布中固然存在差异，延迟退休这种政策不能消除人群中劳动生产率的个体差异，也不能消除群体差异，更无法为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一个足够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得以延续的水平提供保证，自然也无法保证社会的总产出水平。

相比而言，现实维度的研究即便是在存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变（或至少不降低）的假设下开展对

① 鲍曼：《流动的时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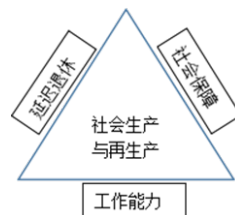
②③ 贝尔、王宏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6页。

表 1 基于后工业时代要求的分群体工作能力现实评价矩阵

工作能力要求	学生	初入职场者	中年劳动者	濒临退休者
知识要求 ^②	3	4	2	1
学习能力要求	4	3	2	1
创新能力要求	3	4	2	1
总分	10	11	6	3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分析，其研究出发点仍比记账维度的更胜一筹。因为只有假设养老基金制度设计完全合理科学，数学和精算工具被运用到工具理性所能达到的极致的前提下，记账维度或更具体而言的养老基金收支关系才能作为不失真的观测工具和预警系统来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现实维度的研究主要针对劳动力开展，以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十分准确，但却不能单将劳动力简化为劳动力数量或在此层面上也较为常见的按年龄或行业分布的劳动力结构，这种简化固然便于研究的开展，也应当承认是研究的惯常操作，但这种简化同样回避了上述的对“劳动生产率不降低”这一研究前提的质疑。对劳动或劳动力的有效性^①的考察分析或许能够增强我们对“劳动生产率不降低”这一前提的真实性的判断力，能够让我们对延迟退休政策及其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更为准确的效用评估和全面反思。劳动或劳动力的有效性，换一种说法即工作能力，在此这种工作能力不作个体面向岗位和人群面向产业的单复数区分，在具体考察时将会兼顾宏观的现象分析。后工业社会对人提出的新要求，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工作能力。至此，我们顺利建立起后工业社会中延迟退休、社会保障和工作能力这一三角分析框架，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能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能力的危机是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图 1 三角分析框架示意图



四、后工业社会工作能力的要求：变化与现实

后工业社会对人的工作能力提出新要求，所谓工作能力的变化固然蕴含着工作内容变化，但后工业社会对工作提出的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却是要求工作者具有应对变化的能力，而且这种变化速度超过了过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发展时期且仍不见有减缓的趋势。因此，后工业社会对工作能力的首要要求就可以表述成应对高速变化的能力。

工作能力的要求已不再是过去工业部门中，尤其是在延迟退休研究中经常考虑的老龄群体的就业现实性中所提到的老年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单纯考虑老年群体，特别是濒临退休的老龄劳动者的生理状况，能够回应的是面向过去的，尤其是以流水线为主的工业生产劳动强度，以及以坐班制为主的传统的面对面的服务业；所考虑的心理状况，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考察老年劳动者对休闲和工作的偏好，对养老金收入水平和延迟退休继续工作的收入水平的比较选择，即老年劳动者群体愿不愿意继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工作。因此，生理和心理状况的考虑已经难以切中后工业社会所提出的工作能力要求。

后工业时代对工作能力的要求，在剧烈的技术革命和知识创新大势中，在现代发达方便的信息通信网络和交通条件这两大被丹尼尔·贝尔称为后工业社会的基础结构的助推下，表现为对知识的要求，对学习能力的要求，对创新能力的要求。

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丹尼尔·贝尔指出如果资本和劳动是

① 劳动或劳动力的有效性能够为“劳动力生产率不降低”这一假设提供推理前提。

② 将知识要求操作化成一种对跨学科跨行业的边缘知识、新知识和知识联系建立能力的要求。

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不在于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①因此,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者,其价值的取得在于其作为一个知识的承载体和生产者,同时具备将知识变现的能力。无利可图的知识是不值得生产的,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取向并致使基础研究的投入缺乏。将知识变现的能力与现今一个流行的说法相契合,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或更常用的“创新创业”。在世纪之交的那段时期,“产学研结合”也曾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流行词汇。其实这只是这种变现力要求逐步深入到教育和科研系统过程的一个见证。

对知识的要求,对学习能力的要求,对创新能力的要求其实是知识价值论下对人的知识结构系统的三个目标层次:对知识的要求侧重于静态性和总体性,可以被操作化成学历学位和相关的技能和资格证书;对学习能力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人们相应地会提出跨学科学习、终身学习等获取和保持该方法,并要求大家成为善于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②,在组织层面则提出建设学习型组织,重视培训^③,这样的一种要求在21世纪以来一直被加强;对创新能力的要求是一个老话题,创新被企业和组织所强调,用什么词语来形容都不为过,也是全民共识。有科技制造型龙头企业的掌舵人更放话要全员创新,全职业生涯创新。^④但从未有人说得清创新何以实现,这里的创新并非指学术上的或者单纯的技术上的创新,所强调的依然是面向市场的变现能力,而且这种变现不是指工业社会中将劳动要素投入后将产品生产出来再推向市场进行出售获利,而更偏向于将这种生产能力及其保障运行的知识系统和组织实体一次折现,这既是来自知识生产本身的紧迫性要求,也是对后工业社会诸种断裂的恐惧的一个反射——如果不将最新的成果折现,万一在下一波潮流中没跟上节奏将一无所得。^⑤

因此,与这样的工作能力要求相比,现实是怎样的?延迟退休最直接的受影响群体——老龄劳动者群体能够达到上述的要求吗?似乎无须仔细考虑都能作出否定回答。是不是这一代的老年劳动者的绝对知识结构过老以至于无法适应上述要求?如果我们将考察范围扩展到其他人群,会有何发现?可以将人群划分成学生,职场初入者,中年劳动者和濒临退休者,并用上述的对知识的要求,对学习能力的要求,对创新能力的要求三个层次来衡量。

显然,仍处于教育系统的学生和职场初入者学习能力最强而且知识系统理论上获得了最新的更新(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知识和技术的掌握),随着年龄越大,离开学校时间越长而逐渐衰减。对于绝对知识体系的衡量排序,传统上无论是受经验价值论还是人力资本存量影响,都是从濒临退休者到中年劳动者、出入职场者和学生降序排列。社会主流价值和社会制度、组织环境允许利用工作经验积累对从教育系统获得的知识体系进行填充和丰富,而如今这种路径几乎已经被封死。对经验的重视变成了对现存的从上一生产方式残存下来的经验进行收割并以大数据进行分析和程式化,不再容许新的经验生成,工作和流程都需要遵循严格的复刻逻辑,虽然这种规范化与真正的创新之间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⑥因此对于知识结构或知识存量,对知识的要求更多变成一种对跨学科跨行业的边缘知识、新知识和知识联系建立能力的要求。目前社会上的创业群体主要是学生和初入职场者,大体而言都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从结果看中年劳动者,特别是濒临退休者,在创新能力上远不是学生和初入职场者的对手。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于后工业时代要求的分群体工作能力现实评价矩阵见表1。^⑦

从评价结果看到初入职场者得分最高,学生次之,中年劳动者再次之,濒临退休者最末,说明最能符合后工业社会要求的劳动者群体是初入职场者。然而吊诡的是这某一初入职场者群体经过几年成为中年劳动者,他们的优势将会被下一群初入职场者取代。这种现象同样暗合着后工业社会的基本逻辑之一——收

① 贝尔、王宏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1页。

② 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③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④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2018年1月1日于“企业家的新时代”主题论坛上的演讲。<http://gd.qq.com/a/20180102/002909.htm>。

⑤ 如长虹电器押注在等离子电视上,诺基亚执意发展塞班系统拒绝安卓,都惨淡收场。

⑥ <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71211/4375738.shtml>, 2018-01-02。

⑦ 虽只作了现象归纳和推理,没有经过严格验证,但仍有一定价值。表中分4级打分,4分为最高,1分为最低。

割折现逻辑。知识生产的速度很快，作为个体的学习能力不能跟上这种节奏，以至于社会和组织用人替替代策略所形成的总体效应来应对这种加速。无论是从华为等科技巨头疯狂垄断式的招聘，尤其是校园招聘，还是从同样出自深圳的中兴的中年员工跳楼事件^①，都可以看出这种对人的输入和挤出的强劲力道和疯狂速度。

延迟退休从上述的工作能力要求和现实之间的裂痕看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延迟退休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劳动者，或至少是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退休年龄较为固定的正规就业者。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广义的公务员群体，确实最容易受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在私企或国企工作的人员需要面临更大的被淘汰被辞退的风险，而公务员群体则严格按照政策执行，一般都是到龄退休。但如果深入考察公务员群体的工作生态，就不难发现濒临退休者其实没有太多的实际产出，尤其是在升迁无望以及职业倦怠的情况下。传统观点认为公务员群体普遍存在职业倦怠，是由公务员的工作内容决定的，与工作激励不到位、政绩考核不科学也有关系，但更多的原因可能还出自工作能力的不足。公务员系统里的分群体工作能力分布，基本也服从表1的结果，而且公务员系统中各系统长期依赖从直系下级中抽调人员完成工作任务也不算是秘密，而是一种惯常的做法。^{②③④}借调本身是给个体提供锻炼机会，同时为上级获得有效基层实况情报提供支撑的制度，如今也往往异化成一个同样服从为跟上后工业社会高速运行速度而发明出来的收割折现逻辑的制度。因此，延迟退休即便能在公务员队伍实现，对政府效率和政府的总体外部性也裨益不多。

如果延迟退休制度主要面向的是工业劳动者，那么对延迟退休的效应预期就应该考虑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并在前工业 - 工业 - 后工业这一时空共存层次获取其联动关系，并真正关涉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

五、作为工业社会产物的社会保障：初心、扩张与不对称

延迟退休一般被作为化解养老基金收不抵支难题的一个方案提出，养老保险制度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据核心地位，因而延迟退休天然地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关联。回溯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及其在工业社会中的发展，或许可以寻找到初心和使命，凭此可以更好地看待延迟退休和社会保障，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

回顾历史，社会保障最先是从小保险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保障的萌芽阶段，以16世纪前后的英国为代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圈地运动使得农民流离失所，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的济贫以缓解社会矛盾。人们被迫离开土地，从自身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部分进入了工业生产中劳动谋生。就此，生产与生活分离开来。在原先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是围绕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基本自给自足，人们也被固定于牢靠的以血缘亲属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中。所有的风险都是家庭的风险，都依靠家庭的力量解决。因而不需要太多的保障以弥补家庭以外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缝隙。而进入工业社会，农民离开土地，工业社会不能容纳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的这些由农业部门撤出的人口，工业生产能够获取利润而不负责任解决这些问题，资本家把通过建立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来赚取利润和维系市场自身循环而不认为对这些流离失所的贫民负有责任。但由于这些贫民的活动以及所激发的社会矛盾危及经济秩序，政府在维系自身统治和在资本家的胁迫，或者说与资本家的合谋下，于1601年推出《济贫法》。《济贫法》的出炉不意味着英国政府的仁慈，这是政府在理性考虑下不得不以此为之。这个时期是农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时期。下一个时期即被誉为社会保险形成时期的德国俾斯麦时期。19世纪末的德国工业化发展更加迅猛，劳资关系严峻，为了应对产业工人的风险，德国政府不得不出台《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老年和残障保险法》三项法案。这些法案的背后同样反映着原属于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劳资矛盾的转移，虽然在法

① http://news.ifeng.com/a/20171217/54253573_0.shtml

② 李军鹏：《借调困境与“编制”难题》，《人民论坛》2009年第21期。

③ 潘进良：《政府机关借调现象探析：从规则到制度》，《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9年第1期。

④ 蒋夫尔：《教师借调该休矣》，《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29日。

案要求下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总体而言,政府也被迫参与到这种社会风险的承担中并作为最后兜底人负起社会保障的主体责任。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为这建立起一种机制,将当期应该给付的足以应对风险的待遇抽起,并打了一定的折扣,利用风险事故发生的特性,将所有人的风险捆绑在一种制度运行上,以此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使企业能够有更多的利润以及扩大生产的可能。政府参与到这种合谋当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仍然在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面对全球市场的开拓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政府似乎显得更为积极。这是而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以美国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保障法》为代表,标志着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此后各国纷纷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注意到这一时期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全球经济大危机后,实际上意味着上述以德国为代表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险制度的破产。社会保险制度可以解决个体在其自身遭遇疾病、失业和衰老时的基本生活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当整个社会出现危机时的风险应对问题。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究其根本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和消费的恶果,在一般情况下由社会保险负责顺滑,但在危机全面来临之时社会保险制度也变得不堪一击。

如果说罗斯福所提供的这种有针对性,只针对下层人口和弱势群体而进行的保障仅仅是正面回应了当时的时代需求,那么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恰恰需要这种保障来作暂时的救赎。而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即以英国贝弗里奇报告为启动标志的,直至 1948 年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即意味着西方已经下定决心誓以社会保障应对由经济发展所必然引起的社会危机。国家对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从生到死的一切安全保障既是对由国内巨大的贫富不均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安抚,又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更高阶的历史阶段,逐步进入消费社会。只有将民众豢养起来,才能使工厂的流水线不停产,才能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然而,这种机制得以维系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对欠发达国家民众的剥削和自然资源的贸易式掠夺,即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得以运行是建立在现实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艰苦的物质生产之上的,由此造成了世界更广泛的失衡,引发局部战争和难民危机。因而,现在这些难民涌入欧洲希望求得生存,欧洲社会保障的制度随即出现混乱,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自食其果。

从农业社会通过工业化转入工业社会,再转入现今科技创新和虚拟时代即后工业社会,包括现今的中国同样步入后工业社会。区别于欧美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国在其广袤的国土上同时存在着前工业的、工业的和后工业的部门,中国跟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是收纳那些市场逻辑的化外之人,尤其是在经历去传统化和去集体化之后,社会保障系统成为唯一的最后的“收容所”和“救赎地”。

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并形成福利国家的终极形态看,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的扩张到了极限,其肩负的使命越来越重,但社会保障制度为冗余人口提供的救助是以对外资本输出和贸易殖民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由工业化而生,维持工业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其扩张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扩张。

从中国自身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延续至今,无论是从微观的过去的农民工参与劳动但不缴纳社保费用(相当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风险分担系统之外)、缴纳但回原籍后不享受待遇(相当于作出劳动和缴费双重净贡献),还是从宏观层面经济发展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分析,都可以轻易其依赖于前工业部门对工业部门乃至后工业部门的输入,广大的农村地区对城镇和大城市的输入。这里某种分层次的对对应关系也不言而喻(见表 2),但同样沿着工业化的扩张道路持续跟进。

表 2 生产部门与地域分层

前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	后工业部门
农村	城镇	大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尝试着进行某种扩张,以养老保险为代表,截至 2017 年末,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覆盖 9 亿多人^①,并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形式覆盖数亿农村人口。传统农业社会生产与生活

^①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2-31/8413457.shtml>, 2018-01-02.

是合一的，或者说是生产围绕生活展开的，因此对于没有工资收入的农民而言，缴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本身是一种不相称的事，与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能获得的难以支持生活开销的养老金待遇一起彰显出社会保障制度偏离自身运行发展逻辑之后所进行的扩张的无力。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向前工业化领域的扩张；而向后工业化领域的扩张，则显现为对包含从事知识生产和创意工作的某些自由职业者设计出来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通道，向后的扩张更为隐秘同时也处于萌芽阶段。这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化设计的一个体现，而多元化思潮本身被提出和流行也是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去制度化去组织化后的个体自由选择，这种自由和个体化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去制度化后所强迫的不得不自由。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选择是以自身的碎片化的制度化去应对外界的去制度化，因为它似乎是人类社会剩下对个体生存极具意义的硕果仅存的制度依靠。这种扩张，从传统的形式和现实的能力看，都极不对称。

因此，试图通过由工业化衍生的社会保障制度去解决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所出现的问题都面临极大困难，上面的讨论已经展现了这种现实冲突。对于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不少的研究也在呼吁这种多元化，将选择权交到民众手上，届时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理性分析作出相应选择。但这种理性只是对于个体的理性，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风险最小化，不愿意参与风险分担，实际上就逐步瓦解了建基于风险共担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同时社会也将失去社会保障这条底线而失去生产和再生产能力，这时面临的的就是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而回到延迟退休主要面向工业部门的劳动者这个论题上，就可以发现按照目前的分配结构和一般收入水平，通过延迟退休来保持工业部门有相当的就业规模也可能只是一个理想状况。对社会总体而言，资源和人力资源从前工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乃至后工业部门尚且循序渐进而且对这种节奏的有效控制是对当今社会最大的维护；但对于个人而言，希望从以农业为代表的前工业部门直接跨入以信息金融行业为代表的后工业部门，似乎是大多数人的奋斗理想，大城市的人口激增而需要想法设法控制、技能人才短缺而造成的招工难、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这一系列社会现象都是明证。因此，从微观到宏观可以推断，延迟退休仅仅面向工业部门的从业者也不具有现实性。

六、发现与结论

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通过围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这个核心展开的延迟退休、社会保障和工作能力三角分析，得到以下发现：

一是后工业社会对工作能力提出了以应对变化为核心的新要求，包括知识要求，学习能力要求和创新能力要求，以此对各个群体进行现实评价发现这种要求在后工业社会的收割折现发展逻辑的笼罩下，不可避免地随年龄或工作年限的延长而出现整体性衰退，濒临退休群体无法在延迟退休后继续满足工作能力的要求，即就后工业社会的工作能力要求而言，实施延迟退休的是不现实的。

二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收割折现发展逻辑统领下，通过对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倦怠说和升迁无望说进行解构，结合对政府机关借调现象的还原分析，发现公务员队伍的现实工作能力同样符合随年龄或工作年限的延长而出现整体性衰退，通过延迟退休政策来提高政府效率，提升政府的外部性，保障和促进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这一路径也不可取。

三是回顾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明确社会保障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结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梳理，发现其扩张路径和步伐紧随工业化进程；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分析，特别是讨论了社会保障制度超越其自身发展逻辑而向前工业部门和后工业部门延伸的多元化扩张尝试，呈现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关键间质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其作为“最后的制度”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功能保障和兜底红线，与去制度化的社会现实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四是延迟退休制度如果只面向工业部门，即在工业部门内，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展开，仍然会受到前工业—工业—后工业这一层次的联动和附着于其上的资源与劳动力流动的严重干预而无法维系。从记账层面上无法维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平衡，也无法维系现实层面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

在这四个发现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形式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提出严重挑战，可能酿成总体性危机。延时退休制度在后工业社会的要求下难以取得社会实效，既无法延续社会保障制度，也无法解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危机。社会保障制度在后工业社会中自身难以继续，也无法解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危机。对前工业 - 工业 - 后工业部门的有向流动的速率控制有益于延缓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到来，但后工业社会的收割折现发展逻辑以及去制度化后的个体化正从宏观环境和微观选择两方面对危机的到来进行加速。对后工业社会的收割折现和高速发展需要深刻反省，并在有限的将来将其彻底改变。

(责任编辑: 王胜强)

Delayed Retirement, Working Ability, Social Security and Overall Crisis i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LUO Zhe, ZHANG Junf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basic dimensions of delayed retirement research, we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case study literature on delayed retirement, and fin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are seriously fractured. Based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after the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lay retire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work ability of triangular analytical framework, summed up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on the work ability of the system to delay retirement to find expected to play a role;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combing the social security, the mission and function,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industrial logic try diversification forward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based 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s a key industrial society and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transition is the interstitial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function of security and reveal the red line, but to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reality of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On this ba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may lead to a general crisis. The demand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system i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can not continu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nor can it solve the crisi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itself i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 can not solve the crisi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former industrial industrial industrial sector - directed flow rate control is beneficial to delay the overall social crisis, but the harvest discount of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arrival to the individual after the system is to accelerate the crisis from two aspects which are macro and micro environment choice.

Key words: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delayed retirement, work ability, social security, overall crisis